

資	廣
料	東
	文
46	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五年·广州

责任编辑 黄国建

广东文史资料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169,169字

1935年9月第1版 193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20册

书号 11111·166 定价1.50元

目 录

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三)	陈 谦(1)
清末的中葡澳门划界交涉	黄鸿钊(65)
香洲开埠及其盛衰	何志毅(87)
回忆抗日时期地下党在广东“学生集训总队”、“地干所”的斗争经过	吴 仲(97)
回忆地下党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 在广东省银行的活动	邓 筠 施 琦(125)
抗日期间广东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在我党 领导下开展斗争的回忆	陈长源(133)
我利用广东省调查统计室的关系向敌斗争 的忆述	吴 仲(146)
忆述我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 经过	汪孟华(151)
孙中山先生与段祺瑞、吴佩孚	田 桓 遗 作(160)
魏邦平在护国护法时期的活动	杨其伟(166)
百岁画家冯钢百	李松庵(180)
历史学家朱杰勤	潘亚瞰(198)
邹韬奋在梅县	侯月祥(207)

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三）

陈 谦

编者按：《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一辑刊载了陈谦的《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一）》；第四十四辑续载《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二）》，现本辑续载第三部分。内容包括：二十四，香港医院；二十五，香港西医；二十六，香港中医；二十七，香港坟山；二十八，东华义庄；二十九，贩卖鸦片；三十，香港防务；三十一，香港义勇军；三十二，香港货仓；三十三，香港工业；三十四，香港的粮食供应问题；三十五，保良局；三十六，香港不缠足会；三十七，香海吟坛和正声吟社；三十八，香港的旅游地；三十九，香港的游乐场所；四十，香港的海浴场；四十一，香港的戏院；四十二，香港的地产；四十三，香港的当押业；四十四，香港的金融业；四十五，香港的办馆行业。

二十四、香港医院

清人王韬《香港略论》说：“香港本南徼濒海一荒岛”，一八四一年居民不过四千，半是渔人，半是农人。水土恶劣，蚊蝇滋生。

英国占据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四年间，驻防英军常患痢疾、疟疾及其他恶性传染病，尤以一八四八年为甚。于是港英当局为保障军政人员和居民的健康，急急从英伦派遣医生来香港设立医院。除海军医院、陆军医院及山顶医院，专为诊治海军、陆军、高级政府官员和英国商人大班外，并在港九地区建设不少医院，大约可分数类：1.国家医院，2.公立医局，3.东华三院及广华医院，4.教会设立的医院，5.私人开办的医院，6.专科医院。

（一）国家医院

国家医院建于西营盘，与高陞戏院相对，由皇后大道西直通至半山区医院道，占地颇广。本来是为诊治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而设，但香港居民亦可到院医病。按照香港规例，工作人员患病，至多请假一天，逾期要得到国家医院医生批准。倘无医院医生的证明，除扣发工资外，并给以处分，甚或被辞退。所以国家医院的医生权力很大，对待病人，面孔冷酷，使人望而生畏。

国家医院分为门诊部和留医部。院长由英廷选派。诊治医生都是英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香港大学医科成立后，规定学生在最后一段时间，要在医院实习，所以国家医院除医生、护士外，并时见实习医生。门诊部规定时间，挂号取筹，先交与当值护士，由护士分送诊治医生，病人听候传呼就诊，就诊后持方取药，经过时间很长。但如果医生认为需要再诊，则预约时间，届期前往，不必轮等。门诊药费不甚昂贵，医生多数负责，一九五〇年以后，人多挤拥，挂号不易。经过门诊，医生认为须留医者转送留医部。

留医部的病房，分别男女，并分内外等科，神经病患者特设一房，对患传染病者则采取隔离，但自设传染病医院后，病者经诊

断后即立刻转院。每一病房，设病床大约八张，每床位隔离约有二、三英尺。每一病房由看护轮班负责，按时检查病况，记入病人病历，挂于床前。每日医生早午晚都巡回察看处方。在一九五〇年前病人留医，医药费连膳食等合计大约每天港币一元五角，但院内有特等病房，个人独住，设备华贵，收费特昂，闻每天需港币百数十元。

留医部后来还设有透视肺病X光镜和心电图、脑电图等等。手术室由专科医生负责，手术后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许亲人探视。在探病时，有各种规定，限制极严。

根据陈轭勋《香港杂记》的记载：“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每年就医者约有二千人。”在一八九一年间，“差役就医者有五百七十名，商人就医者有一百三十五名，自备药资就医者有四百六十四名，皇家人员就医者有一百七十九名，打斗致伤由巡理府发落就医者有二百四十名，穷人无靠入院就医者有二百七十九名，是年统计入院就医者有一千八百六十七名。”以后香港人口增加，入院就医者应有所增加。“在一八九一年在院病逝者八十四名，验尸五十九名。”香港法例，自杀和突然死亡者等等，或死者之病症有可疑者都须在国家医院剖验，查明原因存案，所以国家医院除设有殮房外，并有验尸处。

在九龙方面，设有九龙医院，性质与西营盘国家医院同，亦是为了政府工作人员治病而设，并有门诊部诊治街坊居民。

由于香港居民在一九三一年后大增，国家医院无论门诊、留医都挤拥异常，而且科学日新，医术改进，港英政府鉴于形势需要，乃建设玛丽医院于浅水湾。该院占地很广，只收留医的病员，设备颇新，为香港最大的医院。

入玛丽医院留医，须先通过西营盘国家医院门诊，医生认为

病情严重，须要留医，或患甲状腺癌肿和子宫癌等等，须要施行手术，才由门诊医生介绍入院，但由于病床紧张，医生一经决定，即以救护车送往。其他则是患有急性病，雇用圣约翰救护车或消防局救护车送往急诊。至于斗殴致伤、服毒自杀或饮食中毒等等，则由警差将病人用救护车送往医院医治。大房每天亦收费一元五角，只供三餐膳食，营养品另收费。政府人员另有优待办法，警差送往留医，费用常可豁免。院中病房宽大，病床清洁，每房指定护士值班。有一个时期，玛丽医院施大手术，由英国大医生的比（音译）主治，更为香港人所称道。院长由英国人充当，医生多数是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学士，如杨嘜华、蒋英雄、关其湛等，都曾在院服务。药房配药主任亦是英国人，由领有药剂师证书的中国人民工作。院中医生处方，多用市面少见的新药。

院中并设有护士班，招收英文书院中学毕业领有大学高级入学试的学生，但以庇理罗士女书院、圣心女书院、拔萃女书院等的女学生为多。课程依照英国护士学校，严格训练，毕业后在院服务，经过一个时期，可以外出作私家看护。

在六十年代，港英政府为了纪念葛量洪总督，于九龙设立葛量洪医院。其始本专为患肺结核病者医疗而设。但其后为治理慢性病，如风湿关节炎、冠心病和半身不遂的瘫痪病人不能久在玛丽医院或其他医院留医者，各院便将病员转送该院收留治疗。因此这院的病员多是长期留医，病到好转，才送之出院。

（二）公立医局

香港各区都有公立医局，设立很早，与广州的医疗站相似，规模很小，经费由政府负担，设西医生一人、助手一人，以方便居民有一般小病得到及早治疗为主。至于地区的小儿防疫工作亦是公

立医局负责。倘医局发现病况严重者，即转国家医院或其他医院留医。

各公立医局地方不大，而医生多是香港医科毕业，助手则是英文书院的中学毕业生。我所知道的公立医局辛亥革命后在中环鸭巴甸街道济会堂地下有一所，由李可桢医生负责，其后道济会堂拆卸，医局迁于九如坊，由廖思德医生负责。只须挂号，不收诊金，药费亦廉。又湾仔石水渠街亦有公立医局一所，规模较大，由何高俊医生负责，并设有产房，平民妇女多往留产。

五十年代后，香港医生缺少，于是港英政府放宽医生尺度，准许一部分国内毕业的西医师担任公立医局工作，但不能签发死亡证。

（三）东华三院

编者按：《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发表了《香港东华三院概况忆述》一文，介绍东华三院颇详，为避免雷同，故删去此段。

（四）教会设立的医院

香港基督教会所设立的医院，在一九五五年后，陆续有所增加，我未知其详，仅就寓港期间所知的略记如下：

那打素雅丽氏合院建于半山区的般含道，是那打素医院和雅丽氏医院合并而成。两院同属于伦敦教会管辖，合并后业务有所发展。那打素医院设于般含道，在香港初开埠不久，即已成立，以产科见称。初时医生是由英国派遣，其后聘请在英国本土或英国殖民地毕业的西医生。全用西法西药，并有手术室，收费不多，贫者可以减免。雅丽氏医院设立于一八八七年，香港大律师何启夫人雅丽氏（英国人）逝世，遗下巨款，何启扫数捐出建设雅丽

氏医院以作纪念。院址设于荷李活道道济会堂楼下，聘请英国医生掌院，全用西法西药，有门诊和简易病房两部，免费为贫民治病，其后得到庇理罗士的援助，业务扩展。何启和庇理罗士都是雅丽氏医院的董事。一九二一年后，道济会堂因屋旧拆卸，改建民房，迁往般舍道合并为合一堂。而雅丽氏医院亦同时迁往般舍道，与那打素医院合并，改称那打素雅丽氏合院。

合院建筑，楼建数层，楼下入门处为挂号处和门诊部。门诊部由值班医生诊治，病患者携处方取药，收费颇廉。若贫穷者，可以免费。二楼病房，区别男女，有大房和私人房两种，大房有十数张病床，由当值护士照料，一九三〇年左右每天收费港币六角，膳食在内。私人房每个面积大约一百平方英尺，只设一病床，若需陪人可以加多一小铁床，一九三〇年左右每天收费港币四元，陪人收费一元五角，膳费在内。合院是由教会管理，规定每星期早上，所有院中医生、护士、工作人员及病员都须齐集“合一堂”讲道（院的内部有门通“合一堂”），不能躲避，所以耶稣教会人士，多在合院留医。

一九三二年掌院是英国人接臣（音译）医生，他长于手术，与国家医院的比医生齐名。那时我爱人林玉清曾住院由接臣医生为她割治膏瘤，施手术后，情况良好，住院十五天即可出院，连陪人膳食合计，共收费数千元，但由于该院是慈善性质，病员出院，常有捐献，因此我捐助百元。

那打素医院一向以产科著名。合院后设备更佳，我国妇女多有入院留产，收费不多，但院中病床过少，非预约留产不办。合院对于留医者，仔细观察，急病重病不收，如病员症状转危，即通知病者家属转送国家医院，绝少在院死亡者。

合院设有护士班，特别取录英华女书院肄业的中学毕业女

生，严格训练，成绩颇佳，与玛丽医院护士班同为香港培养护士人材的有名学校。毕业后各护士多在合院服务，亦有自己悬牌接生者。

法国医院设于铜锣环，由铜锣环电车站转入不远的大路上，为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环境幽雅，设备亦佳。但医院属营业性质，为富商大贾服务。除一小部分大房收容天主教人士住院留医，收费较廉外，其余都是私人房，设备华贵，有沙发椅、写字台、衣柜等等，每天收费在一九三〇年已需港币三十元左右，并且每一病房由院中医生早晚巡视，开药订方及护士照顾都另外收费，若聘请院外医生会诊亦所欢迎，但处方用药须得该院医生同意。手术、输血、注射等费用另计。院中膳食，供应两餐，亦每餐记帐总结。因此在法国医院留医者，时间虽然一星期或半月，而出院付费常达到港币数千元。附设产房在一九五〇年后，收费五百元，住房膳食另计。

院中亦有殓房，但在入殓时不准哭泣，只能默哀。出殡时，过了院的通道才准奏乐。

总之，法国医院在香港人心中认为是贵族医院，劳苦大众无从入院。

（五）民办医院

一九一八年春，香港春季大赛马，时尚未有用水泥钢筋建筑的公众看台，由各私人团体雇人搭竹棚招待人们博赛，以汇丰银行的竹棚为最大。但棚下空地，多摆卖熟食档，某日熟食档不慎失火，迅速焚烧，人多路狭，难以逃生，酿成空前浩劫。大火数时不息，死伤人数逾千，于是跑马地黄泥涌一场，顿成“鬼墟”，人都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那时在跑马场对面的“愉园”和

“樟园”，本是港人郊游胜地，经此变故，游人冷落，生意萧条。樟园停业，遂将园地开投。于是香港的华人西医生集众会议，认为香港那时尚未有专为病人休养而设的医院，倘集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买入该地，专为病人休养而设立医院，相信必获大利。此议得到各西医的赞同，乃公推李树芬为首集资，投得该地，向政府注册为有限公司，称为养和园。

养和园地址远离市区，空气清新，兼有花木，适合病人休养。园设当值医生一人，下有工作人员及护士。园的病房，分为数等，收费不同，一等每天收费港币十余元，不供膳食。每一病房，由主家延聘西医生诊治，当值医生和护士只负巡视之责，不开处方用药。医生来园诊症每次照出诊计，倘施手术，园中设有手术室，另收费用，医生及护士均由主家聘请，因此住园收费虽比法国医院略少，但当时在园留医，亦非一般香港居民所能办到。陈济棠时代，莫秀英患病，曾在养和园专聘李松西医治月余。

其后香港的游乐场逐渐发展，愉园已成落伍，游客渐少，遂将愉园地段拍卖，养和园公司又复投得，将园扩建，设备更佳。在一九四一年以前，为香港高级华人疗养治病的唯一地方。但病人入院得由西医介绍，否则不收。

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香港分科医院，设于下花园道，新型建筑，设备亦佳，是香港华人西医组合而成的医院，所谓分科是分内科、外科、产科、儿科、眼耳鼻喉科等等，分别病房留医。亦如养和园同样是私人病房，不设门诊。患者亦由西医生介绍入院，聘医生及看护。病人入院，医疗及药费均采记帐办法。

在湾仔道设立的马岛医院，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日本医生专为日本侨民治病而设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医院由港

英政府接收。改为专医性病医院，分别男女病房，医生是医性病专家，采用新法及特效药。

（六）专科医院

肺结核医院设于湾仔礼顿山道，由防癆会设立，专为治理肺结核病人而设，病人经过一个时期，情况有所好转，即令出院。

赞育医院设于西营盘高街，由香港政府设立，专为华人妇女留产而设，收费不多，医生是英国医科毕业的西医师，护士由国家医院派出，产妇留院住期约五至七天，婴孩出生后，作为香港出生者，发给登记证。经过若干时间，婴孩和母亲，都须往医院复诊。院中床位不多，产妇留产非预先挂号不可。

至于专为传染病而设的医院，如设在九龙荔枝角的荔枝角传染病院是由港英政府主办，由英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负责，并有护士。港九地区患霍乱痢疾流行性热病等传染病，都要送往该院留医。收费与国家医院同，但禁止家属探问。

一八九四年香港鼠疫流行，死者统计二千五百五十二人。太平山街一带的平民住屋及中环九如坊、美邻里、芽菜巷、善庆里等处人口密集之地，尤为猖獗，一直连续至一九〇四年。香港政府乃将鼠疫丛生的地区民房备价收买，一律拆为平地，不许复建，才得以遏止（参叶林丰《香港地方志》）。闻于老一辈说：那时患鼠疫的病人，各医院都不准收留，只可由洁净局的工役，用帆布车（简易手推挽的救护车）将病人送往隔离治理，死亡即立刻舁往埋葬，并熏洗病人原住屋舍。但舁往何处隔离治理则无从臆测。

东华痘局设于坚尼地城，地近东华义庄，远离市区。为香港唯一治理天花痘症的传染病院，设立很早。由英国医科毕业的医

生负责医治。一九二二年冬，香港天花盛行，小孩死者无数。那时若家有患痘者，一经西医诊治，即报告有关部门，将患痘症者用救护车送往东华痘局隔离治理。但西医治痘未有特效药，患者十死一生。

总之，香港医院不少，但人口众多，医生护士为数有限，居民往医院挂号门诊、入院留医，都是难乎其难。以此港人有病常需聘医治疗，但中医或西医诊金既高，配药尤贵，不是一般市民所能担负，故劳苦大众有病，常一拖再拖，以致小病酿成大病，无可救药，言之痛心。

二十五、香港西医

香港法例规定：在香港开业的医生，必须在香港西医学堂、香港大学医科和英国本土及其他英国殖民地所设立的医科大学毕业生，才能称为DOCTOR（医生），有权签发出生证和死亡证，及诊治各类传染病。凡经香港政府许可的西医生，其名单均在香港宪报公布。

辛亥革命后的三数年，香港西医多是香港西医学堂的毕业生，如关心马便是与孙中山先生同学。其他如何高俊、区斯湛、马禄臣、赵学、杜阁臣等，亦是先后毕业于西医学堂。他们都是全科医生，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一律诊治，尚未有专业一科的医生。他们开业的写字楼（即诊所）多设于皇后大道中和德忌笠街，赁楼一层或二层，并多在诊所经营小药房配所开的药剂。亦有在西药房设写字台应诊，药房为之配剂者。那时西医生门诊费约港币一元至二元，出诊则看路程收费。小手术多在诊所，大手术则转送医院会诊。

由于那时西医生不多，诊金及药剂收入可观，各西医生都是住于半山区，以手车代步。手车多是雇车夫三人，一人在前挽车，二人在后推之。其后汽车盛行，才废弃手车而置私家小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禄臣医生于战前购入六〇六针药，战时缺货，马医生从而攫得大利，成了团团富家翁，为全行所羡慕。

一九一六年后，香港大学医科学生毕业，有即在香港开诊，亦有再往英伦深造者。那时新开业的医生，如王宠庆、黄庆通等，或自设诊所，或在药房应诊，收费与老一辈的西医相同，每月收入亦颇可观。但至一九三〇年左右，留学英伦医科大学的学生，荣膺学位，先后回到香港，多数自行在皇后大道中的大厦如华人行等设诊所，自外国购置新式医疗器械，甚至有些为政府医院尚未有者。又聘护士助理，设备胜于老一辈的西医生，人多延诊。他们并各就自己专业，从事医疗工作。如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眼耳鼻喉科、皮肤科等等，不相混合，处方多用新药，疗效较好。门诊收费三元至五元，出诊另议，收费提高许多。如周锡年（香港绅士）专业眼耳鼻喉科，叶大桢专业内科，皆有名于时。

一九四六年后，香港西医生门诊收费港币五元至十元，出诊五十元起码，比战前更高，透视胸部每次收费十元至二十五元，即检验血压亦另收费，赵不波医生是那时最有名气的西医。其诊所聘有护士、药剂师和自置小汽车，每月收入更为可观。他们甚至对寓于斜路、汽车不能直达的病人住宅拒绝出诊。总之，香港私人开业的西医生，历来都是收费高昂，非仅靠工资收入者所能担负。

至于非英国医科大学毕业的西医生，一律不得称医生，即使

悬牌应诊，只可挂×××西医招牌，既无签署出生和死亡证的权力，亦不准为病人注射打针，开方只可开成药，不能处方配剂，种种限制。但只是尹文楷医生敢于斗争，卒取得港英政府医务总监承认准许开业。

尹文楷医生在晚清时期毕业于我国设立的“北洋医学堂”，并在广州长堤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多年，译有西医书多种，如《儿科略述》、《妇科略述》、《病理略释》、《药理略释》等等。辛亥革命前迁居香港。由毕业于香港西医学堂的西医生区斯湛等，代尹氏向香港医务总监申请在香港注册行医，遭到拒绝，并说：“尹氏毕业于中国的北洋医学堂，不合医生资格，不能在港开业”。使到当时在港的西医生不满。理由是：“不许尹氏在港开业事小，而谓我国设立的北洋医学堂毕业生，为无资格当医生，是瞧不起我国培育的医务人材，怎能容忍下去！”为国家体面计，断不能容许港英医务当局持此态度，必须坚决与之斗争。于是他们群起向医务总监提出质问。大意谓：“尹氏一向诊断用药均有把握，且编译西医书多种，由北洋医学堂毕业经中国政府承认，不能谓为无医生资格。他申请在港开业，为中国同胞治病，实欲减除中国同胞疾病的痛苦。现在香港西医生供不应求，尹氏乐于在港开业，我们以为应是香港政府求之不得者。殊无理由由阻止尹氏自由开业！”持此理由一再向医务总监力争。

卒之，港英医务总监认为尹氏开业问题，他无权解决，要尹氏迳向英帝殖民地行政长官申请。其后英伦方面提出：“尹文楷如能到英伦经过考试及格，可作为具有西医生的资格在港开业”。后尹氏遂赴英伦考试，卒得及格证明，在香港德忌笠街设诊所行医，有名于时。

自此以后，我国医科毕业的人员在港开业，用西法西药为人

治病，仍受到限制，只可称为医师，不能称为医生。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广州市的老西医祢有恒避居香港，虽未正式开业，但老祢医术高明，不少广州的熟客向他求医，有时为了急救，为病人打针注射，于是引起香港医务当局人员的注意。某日，竟通知警署传询，老祢振振有词，得到警方的同情，但为了曾为病人注射针药，被判罚款一元了事。

二十六、香港中医

港英当局视中医为草头药治病者，不予重视。但英帝占领香港后，又声明尊重华人习俗，所以中医开业，倘不称为医生，即不取缔。至最近二、三十年内，才征收中医的营业牌照税，得以正式行医。

我国自民国后，广州始办广东中医专门学校和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等。因此过去的中医，或是世代相承，称为世医；或是文人弃文习医，称为儒医；或是名师秘传。由于我国人患病每喜服用汤药，害怕西医动施手术，打针注射，所以中医能与西医分庭抗礼，乃中国人信任中医故也。香港中医为数甚巨，多从国内前往。如章珠垣、陈庆保、潘陆仙、冯作初、林芷湘、黄省三、陈伯坛等，都是自设诊所开业，陈设华丽，格局与在药店应诊的中医有所不同，除门诊外，出诊亦多，多雇有长班车夫或长班轿夫，每月收入比之在药店应诊者为多。

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广州老中医孔沛然、陈月樵等纷纷迁港开业，但由于香港人口突增，病人众多，而新开业者亦应接不暇。解放后，上海中医陈存仁等迁港开业，作风与广东中医不同，门诊初诊五元，复诊减半，出诊五十元起码。更租赁大厦写字楼